



## 雜誌創刊風景

# 雜誌中的臺灣史

陳俊斌 ◎ 時報出版公司人文科學線主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回歸中國版圖。然而，二戰終結代表的不是四海昇平，反而是另一齣弄人時代劇的序幕。

經過五十年的隔閡，臺灣與大陸儼然已成兩個國度，登時誤會、衝突迭生。光復不到兩年便發生二二八事件，倖存的臺籍菁英多棄筆噤口以保身；復以1949年國府敗於共產黨之手、轉進臺灣，恐共、防共思維與白色恐怖為此後近四十年的臺灣媒體文化定下基調。

威權統治的時代，黨國力量牢牢掌控言論管道。「報禁」加上管制無線電波，箝制了民間增設報社與廣播電臺、電視臺的自由，既有媒體則多屬主政當局的宣傳工具。報紙與廣電媒體既不可得，各種思想唯有利用「參選」或「辦雜誌」才能突破戒嚴體制，甚至頭角崢嶸。但選舉不是天天有，雜誌因而成為解嚴之前知識人、文化人最重要的發聲場域，非主流思想、甚至公然異議之聲皆可見諸其上。

從1949到1987年，臺灣可謂思想戒嚴、經濟掛帥。1949年起推動土地改革、幣制改良，1951年美援到來，此後受庇蔭於美國撐持的全球保護傘之下，臺灣以二十餘年的時光建設有成。社會富裕之後，自然會轉而追求政治民主與自由，這股力量導致七〇年代後期開始政治運動迭起，前仆後繼挑戰威權統治。

1986年，民主進步黨在國民黨默許下成立。1987年7月5日，蔣經國在逝世前一年宣布解嚴。歷時38年、史上最長的戒嚴歲月於焉畫下句點，隨後並展開一連串「媒體解禁」的動作：解除報禁、開放廣播申請、實施「有線電視法」等等，臺灣的媒體自由與日俱增。

2007年適逢解嚴廿週年，回首過往，在那段政治力鋪天蓋地、掌控一切的歲月裡，渴望自由與民主的思潮不斷尋找衝撞既有體制的出口，雜誌正好扮演了最重要的管道。八〇年代以後出生者，看多了今日的媒體亂象，恐怕難以想像過去的封閉與侷限。本文以和「思想」息息相關的幾個領域——人文思潮、政論時評、文學藝術，描摹從戰後到解嚴前雜誌創刊的概況，也提供另一個回顧雜誌出版史的角度。

### ◆ 歷史的過渡：1945 ~ 1949

依目前得見的文獻紀錄，1945年9月在臺中創刊的《一陽週報》，是二戰後臺灣島內第一份問世的雜誌。《一陽週報》由作家楊逵擔任發行人與主編，中、日文合刊，32開本，廿多頁，每週六出刊，自該年9月至11月共出刊9期。同年稍後陸續有雜誌創刊：10月25日，臺灣

省日本受降典禮當天，有左派的《政經報》（發行人陳逸松，主編為臺共領導人蘇新）和「臺灣留學國內學友會」（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大陸求學者在戰後組成的團體）創辦的《前鋒》；11月則有綜合文化雜誌《新新》月刊等。

從1945年到1946年上半年，臺灣的雜誌出版活動蓬勃。二二八之前發行的新雜誌，許多以「新」為名，例如《新新》、《新風》、《新台灣》、《新青年》，展現臺灣民眾對於戰後的新時代充滿期待與歡欣。

但從1949年下半年起，由於通貨膨脹加劇、新聞管制趨嚴，加上10月底開始廢除報刊日文欄等因素，臺籍人士辦刊的難度遽增，脫期與停刊情況屢見不鮮。臺灣人對國府的不滿也逐漸表露，並勇於提出建言。《前鋒》發行一年多（二二八後被迫停刊），正逢臺灣社會動盪不安、經濟崩潰、人心思變的時期，雜誌內容便反映出臺灣人從熱烈期望跌入絕望深淵的痛苦過程。

二二八事件爆發，臺灣人對祖國的孺慕之情完全破滅，代之以驚恐。二二八之前，臺灣雜誌的發行人主要有三種背景：一是臺籍文化人；二是官方機關、學校團體；三是大陸來臺文化人。事件之後，新創刊的民間雜誌多由大陸來臺人士主持，即便有臺籍人士主持的刊物，撰稿者也多為外省人士。

1949年下半年之後，物價回穩，加上大陸出版業的移植，臺灣的雜誌出版才日益復甦。從光復到國府遷臺之前，臺灣新創刊的人文思潮刊物有《前鋒》、《台灣文化》等；文藝雜誌有《新新》、《新風》等；政論性雜誌則有《政經報》、《台灣評論》這兩份在時間上恰相接續的左翼刊物，以及《新知識》、《新台灣》、《民主評論》等。

這段期間創刊的雜誌，發行時間普遍不長，經濟上無以為繼和動輒遭禁皆是主因。例如由臺灣文化人出資、大陸文化人組稿的《新知識》，「只想名符其實的為臺灣六百萬同胞介紹一點新的知識而已」，然因有不少觀點與當局相左，創刊號尚未發行便在印刷廠遭到查封。《台灣文化》從1946年6月創刊，到1950年共發行27期，壽命之長已是箇中翹楚。《台灣文化》由時任臺北市長的游彌堅任發行人，蘇新、楊雲萍、陳奇祿先後擔任主編，初創刊時為綜合性文化雜誌，文學創作、文藝評論及學術論著並重。但1949年下半年起，受時勢所迫亦得轉型為臺灣文化研究的學術型刊物。凡此種種，皆為時局動盪的縮影。

#### ◆ 反共復國與白色恐怖：1950 ~ 1960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12月8日，行政院長閻錫山率領國府轉進臺灣。蔣介石於1950年3月「復行視事」，中共隨時可能進犯，美國卻已放棄對蔣的支持，臺灣情勢



· 1945年10月25日，《前鋒》以「光復紀念號」為特集名稱創刊



一片飄搖。未幾，歷史的轉捩點出現。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旋即參戰，並意識到臺灣在圍堵共產主義擴散上的戰略地位，決定繼續援助臺灣。此舉保全臺灣免於落入中共之手，也鞏固了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

這時期流通的雜誌以政論及文藝兩類影響力最大。不少新創刊的政論性雜誌多以「自由」、「民主」為刊名，諸如《自由中國》、《自由亞洲》、《自由談》、《民主中國》、《民主潮》、《民主憲政》等，頗有與共產中國分庭抗禮、強調國府為合法政權之意。大陸時期的三大政黨都辦了雜誌，《民主中國》與《民主潮》分別由在野的中國民主社會黨及中國青年黨發行，國民黨則有《改造》半月刊（後更名為《中央》），刊名「改造」意在痛定思痛，改造國民黨的體質。

五〇年代的臺灣雖號稱「自由中國」，實則行一言堂的威權統治。當時在政治議題上敢發異議之聲的雜誌，以《自由中國》為代表。1949年底，胡適、雷震等人創辦《自由中國》，旨在宣揚民主自由，待臺海局勢稍安後，逐漸將論政的方向從對中共、蘇聯的批判，轉為反省臺灣的內部問題。《自由中國》雖屢在言論上挑戰當局，然因其主事者為大陸來臺的國民黨員，且僅是書生論政，沒有群眾基礎，尚不致速禍。真正讓當局無法容忍的是，1960年雷震與臺籍黨外人士高玉樹、李萬居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試圖制衡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年9月4日，雷震遭警總依涉嫌叛亂逮捕，下獄10年。自此到七〇年代後期之前，黨外人士只能以選舉的方式，單點突破國民黨的打壓，非主流的群眾政治運動可謂偃旗息鼓。

國民黨對傳播媒介的強力控制，也展現在「反共文學」上。1951年4月，立法委員張道藩銜命創設「中華文化獎金委員會」，獎助發揚「反共抗俄」精神的文藝創作；5月，《文藝創作》創刊，主要刊登文獎會歷年得獎作品。國防部也在1950年創刊《軍中文摘》（後依序更名為《軍中文藝》、《革命文藝》、《新文藝》等），以發揚革命精神、策勵反共抗俄的作品激勵三軍士氣。反共文學成為五〇年代臺灣文壇的主流，在當局大力推動下，連非純粹文學性的雜誌《自由中國》、《文星》都設有文藝欄；有趣的是，《自由中國》雖在政治思維上與國民黨相扞格，文藝取向上則趨於一致。

在反共抗俄的無限上綱下，知識份子幾近窒息。政治思想既是一言堂，他們只能從較安全的文藝尋找出口。1950年11月在臺北創刊的《野風》，便是這樣的產物。《野風》標榜「創造新文藝，發掘新作家」，創刊編輯之一的師範（施魯生）認為：「反共抗俄是一種生活意識形態，用不著搬上文學喊口號。」《野風》除了銷售成績傲人，其所喊出的「將缺點告訴我們，優點告訴別人」，也成為風行一時的廣告語彙。與《野風》同一年創刊的《拾穗》，旨在介紹「自認有價值的科學、藝術、經濟、文藝、娛樂、體育等文獻」，本是中油高雄煉油廠的同仁刊物，深受好評之餘決定對外發行。因其內容益智且涵蓋多數民眾的業餘喜好，發行後亦廣受歡迎。這一北一南、「同年生」的兩份雜誌，是五〇年代民眾重要的精神食糧。

五〇年代重要的新創刊人文思想性雜誌，還有臺灣省鐵路局發行的《暢流》、「向慕眷戀祖國」的專業學術期刊《大陸》雜誌、在六〇年代引發「中西文化論戰」的《文星》等；文藝

雜誌有救國團下轄青年寫作協會的《幼獅文藝》、以函授班培育不少作家的《文壇》、專收名家創作的《作品》，以及學院味濃厚的文學刊物《筆匯》、《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等。1950年以後，報刊雜誌仍多由大陸來臺人士主持，日治時期活躍的臺籍文化人，投稿園地僅限於省市文獻會的刊物，諸如《臺灣文獻》、《臺北文物》，或是民間的《臺灣風物》等。

#### ◆ 政治窒悶，經濟起飛：1961 ~ 1970

1960年，蔣介石在元旦文告中揭櫫「政治反攻先於軍事」；1967年的雙十節文告，則提出反攻大陸「是以時間換取空間」、「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這兩項宣示說明蔣介石瞭解以軍事解決兩岸問題已無可能。黨國第二號人物陳誠於1965年去世，免除政爭的可能性，讓蔣經國順利確定接班態勢。

戰後的臺灣和平推行土地改革，農村因之富裕，地主獲得的資金則轉投資於工業部門，落實「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方針。再加上美援的挹注，臺灣經濟成長的黃金年代在六〇年代來臨。六〇年代初起，臺灣以質精價廉的勞動力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大量吸引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工出口區」大量設立，電子工廠櫛比鱗次。適時加入世界經濟的大循環，是臺灣提升經濟水準、改善產業結構的關鍵原因。

文化場域則是一面倒強調傳統國語文的價值，以及臺灣代表中原文化的正統。五〇年代起，圖書出版業者便以翻印古籍來填補圖書資源的真空；1961年「孔孟學會」成立（同年四月《孔孟月刊》創刊），確定儒家思想為復興中華文化的重點，成為此後四十年臺灣文化格局的主調，足見政府不但將臺灣當作反攻大陸的軍事、政治基地，文化上亦如是。1966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強力批判固有中國文化，益發凸顯臺灣捍衛中華文化的角色。

這時期，政治場域的異議之聲難興波瀾，但終戰前後出生的新一代學院青年從師長身上與書本上獲得新思潮浸潤，他們逐漸冒出頭來，以不同的方式衝撞社會體制。1957年創刊的《文星》，標榜為一份「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雜誌，發刊詞題為〈不按牌理出牌〉，似乎便預言了將在臺灣掀起一股前所未見的風潮。但創刊後幾年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1961年李敖等人加入，編輯重心轉向思想論戰，全面攻訐傳統思維，才成為社會焦點。

李敖與《文星》以論戰的激烈方式衝撞既有體制，學院人士則以其特有的沈潛靜默，思索抗衡反共八股之道，進而引入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潮。1955、56年間，因受美國的經援、軍援，臺灣出現西化風潮，整個藝文界都在學習西方的技巧。並稱「吳夏劉」（吳下流）的吳魯芹、夏濟安、劉守宜三人，在麻將桌上談笑間商定合辦《文學雜誌》。這份雜誌反對文學「不講老實話」而淪為政治宣傳品，因此不刊登反共文學，堅持走純文學的路子。五〇年代後期的文學發展趨勢，便是意圖借西方文學的技巧與思考，逐步突破反共文學的框架。《文學雜誌》歷時四年之後休刊（未曾復刊），但其秉持自由主義，喚起文壇對純文學的重視，引導現代主義美學的興起與成熟，對於六〇年代文學典範的轉向功不可沒。1960年創刊的《現代文學》與1972年的《中外文學》，都有賴《文學雜誌》對後起之秀的啟發和培育。





六〇年代的文壇十分熱鬧，《筆匯》改變路線「捨美就歐」，介紹後期印象派的藝術流派，《現代文學》引介西洋文學理論與方法，而《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純文學》堪稱文學雜誌的「三駕馬車」（辛廣偉語）；詩刊方面則有《創世紀》、《藍星詩刊》、《葡萄園》、《笠》。人文思潮領域的重要新雜誌則有開創史學出版新局面的《傳記文學》、「希望從學術的觀點來討論若干人文學與社會學科的問題」的《思與言》、引介「歐洲文學藝術現狀及其趨勢」的《歐洲雜誌》、在臺復刊的《東方雜誌》、黨外雜誌的先聲《大學雜誌》等等。

#### ◆ 處變不驚，黨外奮起：1971 ~ 1980

七〇年代對臺灣可謂艱難險阻。1971年，美中關係開始解凍，接著臺灣在外交上便節節敗退，1971年10月，臺灣退出聯合國；1972年，臺日斷交；1979年，臺美斷交。凡此種種挫敗，雖然讓臺灣在外交上漸趨孤立，卻也激起國人的團結與愛國意識。經濟方面，臺灣在兩度國際石油危機中雖亦受創，終能挺立不墜，繼續邁向發展之路。此外，1975年軍事強人蔣介石逝世，蔣經國上臺；新人當政，給了黨外人士政治突破的想像空間。

綜合以上因素，李筱峰教授認為，臺灣社會又開始醞釀政治變革的力量，而這些社會力量，分為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是以戰後新生代知識人和青年企業家結合而成的筆陣，透過《大學雜誌》形成的書生論政路線；二是透過選舉而崛起的新一代本土政治人物，諸如黃信介、康寧祥，發展成黨外民主運動路線，也催生了《台灣政論》。

稱《大學雜誌》為七〇年代臺灣最重要的雜誌之一，絕不為過。1968年創辦的《大學雜誌》，最初的關注焦點不在政治，而是一份人文思想性的刊物。經過1970年的改組，才真正成為政治革新的言論管道，1971年起發表〈臺灣社會力分析〉、〈國是諍言〉，1972年元旦發表〈國是九論〉。《大學雜誌》推動的政治革新運動，影響了校園青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國民黨增選中央民意代表。1973年，《大學雜誌》成員分裂，部分成為蔣經國接班後國民黨體系的中間份子（如關中、孫震、施啟揚、李鍾桂），部分則轉而實際參與政治活動，為黨外運動增添新血（如張俊宏）。

1975年8月，《台灣政論》創刊，由黃信介任發行人，康寧祥為社長，原為《大學雜誌》執行秘書的張俊宏主持編務。前監察委員、《人民的力量》作者黃煌雄認為，《台灣政論》是繼《自由中國》與《大學雜誌》之後，由臺籍知識青年與黨外民主運動者攜手創辦最具影響力的雜誌。《台灣政論》創刊號批判官僚制度諸多的不合理現象，出刊後再版5次，兩個月後發行量由一萬增加到五萬，且每期發行時皆須加印前期。這種熱潮自然不見容於當局，同年12月立委增額選舉後橫遭停刊。

1979年8月，黃信介創辦《美麗島》雜誌，聚攏了各方的黨外人士，包括傾向統一的社會運動團體「夏潮」，以及穩健派的康寧祥。《美麗島》在全臺各地設立分社與服務處，儼然政黨組織，而《美麗島》更形同黨外總部。雜誌發行量迅速成長到十四萬本，並在多處舉辦活動。該年12月10日，「臺灣人權委員會」欲在高雄舉辦國際人權日紀念活動，導致高雄（美

麗島)事件發生。事後,《美麗島》相關要角遭受軍法審判,至八〇年代中期民進黨成立之前,黨外政治運動再次經歷一小段低潮。

政治場域之外,1977年5月,葉石濤在《夏潮》雜誌(《大學》分裂後,部分成員成為《夏潮》的作者)上發表了〈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倡言以「臺灣為中心」,創作屬於臺灣的鄉土文學,掀起了一場鄉土文學論戰。創刊於1976年的《夏潮》與黨外運動亦頗有淵源,曾任《夏潮》總編輯的蘇慶黎為蘇新之女,與陳映真、陳鼓應等人大量介紹臺灣於日本統治時期的人事物,並曾於《美麗島》擔任編輯。陳映真後來受《生活與環境》及美國*Life*雜誌影響,在1985年創辦《人間》。

七〇年代新創刊的文學雜誌有樹立專業文學批評的《中外文學》、《文學季刊》、復刊的《文季》(僅出刊3期)、以高中以上讀者為對象的《明道文藝》。1972年,洪健全文教基金會創辦《書評書目》,由作家隱地(柯青華)擔任主編,為作者、出版社和讀者建構一座交流平臺。美術方面則有《雄獅美術》、《藝術家》兩本專業雜誌問世,前者歷25年始停刊,後者至今發行不歇。1971年創刊的英文《漢聲》(*Echo*),雜誌旨在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化;1978年,中文版《漢聲》問世,以中國攝影為主題,發行後叫好又叫座,不僅獲金鼎獎肯定,創辦人黃永松與吳美雲也分獲十大傑出青年與女青年獎。

#### ◆ 思想、政治的解放：1981 ~ 1987

蔣中正逝世不久,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便相繼發生,力道之強、影響之廣,反映出臺灣社會爭取民主的浪潮日益壯闊,但在七〇年代末期尚看不出政治上立即開放的可能。事實上,衡諸中國、蘇聯與國際的局勢,以及島內本土化潮流的壓力,蔣經國很早就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據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得以延續。八〇年代的臺灣因此逐步邁向解嚴、解禁之日。

這時期的黨外雜誌宛如雨後春筍,但遭警總查扣、停刊者依然不少。據統計,1984年5、6月間,警總共查禁22種雜誌,3家勒令停刊,平均每兩天就查扣1件。7月間,11家黨外雜誌社共出刊33本雜誌,18本遭查禁,《政治家》、《八十年代》、《新潮流》等3本雜誌則遭停刊。(《新潮流》的編採與撰稿班底如邱義仁、林濁水等人,組成了後來民進黨知名的新潮流系)。當時黨外雜誌一遭禁,只要以新的刊名重新登記,便可繼續出刊,當局禁不勝禁。

同時間,新的在野政黨也呼之欲出。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並發表「臺獨黨綱」。當時雖未解嚴,警總甚至已擬好逮捕的名單,蔣經國的反應卻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翌年7月15日,臺灣地區正式解嚴,結束長達卅八年的戒嚴時期。

戰後臺灣的建設以經濟為龍頭,由於經濟、產業規模不斷擴大與升級,財經、企業管理的資訊需求日增,七〇年代起有企管雜誌《管理》、理財雜誌《財訊》、廣告雜誌《動腦》等創刊。及至八〇年代,又有《天下》、《遠見》、《錢》等期刊,從內容到裝幀都令人耳目一



新。此時雜誌也益發注重廣告業務，1986年，雜誌廣告首度超越廣播，成為臺灣第三大的廣告媒體，次於電視與報紙。企管財經雜誌的問世與暢銷，加上連鎖書店與暢銷書排行榜的出現，皆可窺見臺灣已進入更趨成熟的商業社會。

文藝領域也有重要的新血加入。1983年創刊的《文訊》以文學評論與文學史料為主要內容，可謂接續了《書評書目》的路線。《文訊》雖受國民黨文工會指導，但政黨色彩淡薄，報導品質也頗受肯定。翌年，《聯合報》創辦《聯合文學》，至今仍是臺灣代表性的文學期刊之一。《講義》創刊於1987年，以「宣揚積極奮發、樂觀進取的生活態度」為宗旨，發行後成為臺灣重要的心靈閱讀材料。

解嚴之後，臺灣社會回歸法治，人身自由獲得更大的保障，各家言論紛呈，即便嚴詞批判政府首長，只要謹守法律分際，不復有觸怒天威之虞。追求思想解禁、政治民主化的目標既達，當年充任重要媒介的思想性、政論性，甚至文學性雜誌，也不再博得多數民眾的關注，一一被時下的熱門的商業性、休閒性刊物取代。但本文所論述的雜誌類型，其時代意義與歷史功績只是遭人淡忘，絕不因社會形態轉變而被抹滅。設若這些雜誌不曾出現，臺灣社會是否有今日的開放面貌，恐怕猶在未定之天。臺灣是個快速遺忘的社會，在記憶消逝之前，且讓我們從雜誌的創刊號裡頭，重拾或建構幾分對過往時代的印象。ISEN

### 參考資源

- 何雅雯（2003）。學院之樹——《文學雜誌》、《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雜談。文訊，213，頁47-52。
- 何義麟（1997）。戰後初期臺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1945-1950）——雜誌目錄初編後之考察。台灣史料研究，10，頁3-24。
- 吳興文（1994）。五〇、六〇年代文學·文化·出版大事記。聯合文學，115，頁128-133。
- 林家成（2006）。回顧那段文學容顏。書香遠傳，37，頁24-27。
- 侯作珍（2004）。文學雜誌與五〇年代臺灣文學主流的轉折。中國文化月刊，277，頁61-84。
- 辛廣偉（2000）。臺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教育。
- 時報文化編輯委員會（2000）。珍藏 20 世紀臺灣。臺北市：時報文化。
- 黃煌雄（2006）。人民的力量。臺北市：玉山社。
- 賴永忠（1992）。臺灣地區雜誌發展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臺北市。